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ZANGJUYIDIANCONGSHU  
藏籍译典丛书

贤者喜宴 · 吐蕃史

〔明〕巴卧·祖拉陈瓦 / 著

黄颢 周润年 / 译注

藏外借

 青海人民出版社

ZANGJUYIDIANCONGSHU  
藏籍译典丛书

贤者喜宴 · 吐蕃史

〔明〕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 周润年译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贤者喜宴·吐蕃史 / (明) 巴卧·祖拉陈瓦著 ; 黄颢, 周润年译注.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12  
(藏籍译典丛书)  
ISBN 978-7-225-05302-8

I. ①贤… II. ①巴… ②黄… ③周… III. ①藏族—  
民族历史—中国—古代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448 号

藏籍译典丛书

贤者喜宴·吐蕃史

[明] 巴卧·祖拉陈瓦 著

黄颢 周润年 译注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71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mm × 1010 mm 1/16

印 张 42.25

字 数 545 千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302-8

定 价 198.00 元 (全2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贤者喜宴

……

序

王尧



记得是 1954 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的代表除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旦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坚参二位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以外，还有一大批西藏著名人物、社会显贵、寺庙高僧和名门望族的官员、勋贵、学者等，其中还有一位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活佛。当时，先师于道泉（伯源）教授听说他手里带来了一部藏文史书《贤者喜宴》（mkhas-pavi-dgav-ston），于老夫子久已知道

这部书的大名。意大利的藏学家杜奇教授在他主持的罗马大学“东方学丛书”上已经宣布了《贤者喜宴》将由他翻译出版的消息。他老人家急切希望能见到这本“名”著。于是跟王森（雨农）先生商量，要把这本书从赤江活佛手中借出来。当时我正在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翻译科做个小学徒，有些方便，几经交涉，说了很多好话，居然从赤江活佛手中借了出来。二位先生喜之不禁，于是商定（全书共700多页，A、B两面）用胶卷照了下来，又一一冲洗放大，粘在一大簿子上，就成了“照相本”（资料应收藏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花了800多元，按当时物价可是一大笔开支，当时助教每月工资56元，可以说相当于一年半的工资了。

不久，我们进藏工作后，又收集到山南洛扎寺版的印本，这就是“木刻本”。于是由民族出版社铅印排版，到出版发行已在1985年了，仅仅重印过几次，这就是“铅印本”。经过多年教学中的频频引用，引起了藏学界注意，后黄颢同志花了相当气力，把“吐蕃史”部分摘译，并加以注释，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连载发表。黄颢同志于1959年中央民族学院藏语专业毕业，又考入学部民族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后在民族所历史组长期从事藏族史研究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直在努力垦荒，在藏族史料的翻译、整理、研究工作上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与贡献。可惜他英年早逝，后面的许多章节由周润年同志续译而成，就是现在大家见到的“汉文译注本”。周润年同志1975年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文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留在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工作，几年后转到教学岗位，孜孜不倦，努力工作，曾参与翻译了《藏族古代法典》《红史》《萨迦世系史》等多部藏文史籍，长期从事藏文史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取得很好的成绩。如今又将《贤者喜宴》中的“吐蕃史”及“噶玛岗仓史”全部译完，即将付梓出版，令人高兴。润年征序于我，义不容辞，介绍了当年的一些往事。

据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生前所撰《贤者喜宴》作者小传所述，巴卧·祖拉陈瓦活佛 1504 年出生，1566 年故世，寿 63 岁，是拉萨地区业塘地方人氏，“尼牙”（gn-yags）族，父名喇嘛达尔，母名拉尼卓玛，是他们三子之中子。五岁被确认为“巴卧曲旺伦珠之转世”，称为二世巴卧活佛，迎到洛扎卓卧寺坐床、受教；九岁时从四世噶玛巴红帽派曲吉扎巴受沙弥戒；二十九岁与第八世黑帽派大宝法王噶玛巴不动金刚相会，得名“大德祖拉陈瓦”。有多种著作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贤者喜宴》。这部书取材丰富广泛，而且吸收了大量原始资料，收集到吐蕃赞普诏告、会盟誓词、吐蕃小邦、氏族分布、五如六十一东岱名录等等罕见史料，有重要历史价值，受到广泛注意和大量引用，在藏族古代历史文献中最受关注。全书分为五大章，计为：

一、世界形成章

二、天竺之章

三、吐蕃古代之章

四、于阗、汉地、西夏（木雅）、蒙古、汉地晚近之章

五、大小五明之章

其最为重要当为第三章，也是全书与众不同的精华所在，受到广泛注意。因在洛扎卓卧寺刻版，故称为《洛扎教法史》，而《贤者喜宴》乃藏族学者常用一藻饰性名称，并以此名世。

## 二

藏族是个富有史学传统的民族，流传至今的藏文史籍不仅卷帙浩繁，在我国的民族古籍中占领先地位，而且门类齐全、体裁各异，各种类别

的文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藏文史籍为研究藏族历史和整个中国历史，以及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历史和中亚地区历史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对藏文史籍的发掘和利用，既是史学研究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从事藏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 （一）藏文史籍的种类及其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一直占有主流的思想地位，自唐代以来，藏文就是传播佛法的文字。所以，我们会发现藏文史籍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宗教密不可分，成了所有藏文史籍共同的，也是最显著的特点。伴随着藏族史学水平和文学表达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内地历代史学方法的影响，先后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不同体裁的史书，如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史、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不一而足。虽然各种体裁的分野并非壁垒分明，而有较多的类同，特别是后期，许多著作既是史册，又是世系史或教法史，这可从标题上反映出来。藏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各类史籍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史籍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二是不同种类的史籍也有互相趋同的倾向，许多不同名称的著作在体例上表现出了较多的类同，但大体说来，它们仍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以下分类予以介绍。

#### 1. 编年史

藏文称为 lo-rgyus，意为按年纪事。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编年史是《吐蕃王统纪年》。在敦煌文书中它是一份残卷，即英藏斯坦因敦煌文书卷 750 和法藏伯希和 P.T.1288 号写卷，它是当时吐蕃王朝及附庸吐谷浑的编年史。编年史的撰述相对来说比较简便，只需将每年发生的大事编

串起来就行，不需要做很多加工和分类整理工作，因而它是最早为藏族接受的史书体裁，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唯一的一种史书类型。吐蕃分裂时期出现的《拔协》（sba-bzhed），也号称大编年史，是一部按时间顺序叙述墀德祖赞和墀松德赞两代赞普的史事的编年史。13~14世纪，入元以后，随着教法史和史册类著作的出现，编年史著作逐渐减少。虽然教法史和史册也都有很浓的编年史倾向，但离纯粹的编年史的距离已经很远了。而编年史作为一种史书体裁一直保存下来，并有了较大的改进。后期的编年史的内容无所不包，不再像《吐蕃王统纪年》那样，每年下面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内容。我们以《青海史》为例，说明编年史的特点。《青海史》用非常准确的资料，将青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著名人物的活动、地理等内容，全都按年编排在一起，它不太强调宗教事件，更少涉及教义、经典等内容，因此比教法史、史册都容易被读者作为历史来接受，它的文字也比较平直，没有很多可以渲染、夸张的描述。

## 2. 史册

藏文称为 Deb-ther，这是一个波斯语经过蒙古语而来的借词，原型为 dabtar，意为文体、书本、记录。藏族人很可能是通过蒙古人这个中间转介接受这个词的。蒙古人较早使用了这个词，在《元朝秘史》中就有“阔阔迭卜帖儿”（意为青册）这个名称。而西藏的第一部史册《红史》的蒙古书名，即为“忽兰迭卜帖儿”，意为红册。史册类著作在各类藏文史著中居于领先地位。继《红史》之后，又有《青史》《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等相继问世，连近人根敦群培也将自己关于西藏古代历史的著作定名为《白史》。这类史著一般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叙述世界和吐蕃的来历，即记载佛教的源流，然后是印度、尼泊尔、汉地、西夏、蒙古的王统；第二部分是西藏的历史，先述吐蕃王统，然后记载各个教



派的历史。这种修史体例对后世影响极大。后出的藏文史书有的虽然名称不叫史册，但形式与史册大同小异，例如著名的《汉藏史集》，它的前半部分内容与《红史》大同小异，后半部分在记述各教派历史时，没有涉及很多教法传承的内容，而是保存了许多藏汉文档案，且对被《红史》忽略的一些地方势力也做了必要的交代，因此比《红史》更具时代感和史料价值，但在体例上仍然与过去的史册一致。后期，史册类著作与教法史类著作已有趋同的倾向，有些干脆合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安多政教史》（Mdo-smad-chos-vbyung）又名《史海》（Deb-ther-rgya-mtsh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藏族史册类史籍还对蒙古族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代以及明代以后出现的蒙文史籍，大都借用了藏文史册类史籍的编撰模式，如《蒙古源流》《黄金史纲》《白史》等蒙文史籍，都以不小的篇幅述说印度、西藏王统和佛教的源头，并将蒙古族的起源与印度、西藏附会在一起。

### 3. 教法史

藏文称之为 Chos-vbyung，意为法源或教法源流。最早的教法史，即著名的《布顿佛教史》，它总述了印度和西藏的教法源流，并附有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的目录。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各教派传承的教法渐趋固定，便相继出现了一批总结某个教派或地区佛教发展历史的著作，著名的有《珠巴教法史》《达隆教法史》《贡却伦珠教法史》《噶当教法史》《安多政教史》和《洛扎教法史》等。尽管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对佛教历史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史的内容，但它与其他类型的史籍相比，要明显侧重于教法传承的历史和对各教派之教义、经典的阐释，以及一些宗教大师的生平著作、寺院修筑情况的记载，它是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最好素材，但很少直接牵涉政治史的

内容。

土观·罗桑曲结尼玛的《宗派源流晶镜史》，虽然书名不是教法史，而是 Grub-mthav，意为教派奥义，但实际上也是一部教法史。它与前述教法史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所叙述的内容要远远超过教法史。土观此书不仅叙述佛教总的历史和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历史，而且还叙述汉地儒教、道教、佛教史和蒙古、于阗、香巴拉等地的宗教史，甚至对西藏本教的教义、大师、传承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 4. 王统记

藏文称作 Rgyal-rabs，意为王族传承世系。这类史籍最早形态是《红史》等书中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王统等章节。它只是简单地罗列王族或赞普的传承世系，以后渐渐超出这个范围，演变为以世系为纲，分目详述其政教事迹的新型史书。一个家族的天降传说、宗教信仰、政治活动、施主的宗教行止、寺院建筑、圣物名目等都成了王统记所记载的内容。王统记一方面继续保持编年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其需要掺入大量的宗教和政治内容。后出的王统记则完全将王室的政治活动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将他们的结盟与战争完全看作是宗教行为。最著名的王统记是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又译《王统世系明鉴》），它是以吐蕃赞普世系为纲，分述整个吐蕃王朝政教、人物历史的断代史。另外，还有一本著名的王统记事《拉达克王统记》，此书前半部分一般叙述印度和吐蕃王统，后半部分则专门叙述历代拉达克王族的政教事迹。王统记和史册类史籍在后期也有趋同的倾向，例如根敦群培的《白史》，全名为《全西藏政教两途之王统白史》。

#### 5. 世系史

藏语称为 Gdung-rabs，意为家族传承世系。世系史与王统记颇为类

似，只是王统记叙述吐蕃王族的世系，而世系史叙述各教派所依附的某个家族的世系；世系史与各教派的教法史也比较接近，但教法史侧重于对教法的传承、教义、经典修行方法的阐释，而世系史相对来说更注意人物的活动、家族的兴衰、寺院的兴建、对外交往以及行政管理等内容的记载。它是研究一个家族、一个教派兴衰历史的最好资料。著名的世系史有《朗氏宗谱》（或译《朗氏宗谱·灵犀宝卷》）和《萨迦世系史》，前者成书较早，专门叙述伯木古鲁派和朗氏家族的历史，它对朗氏家族的来历、兴盛，特别是它在元代与其他各教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并吞各部的历史记载甚详。后者尽管成书较晚，但它所依靠的是《萨迦世系口饰》等四五种早期史著和藏于萨迦寺的大量元代政治档案，书中收录了元代皇帝颁发的一些诏诰和萨迦派高僧给元朝皇帝、西藏僧俗头人的信件，弥足珍贵。《萨迦世系史》与《朗氏宗谱》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是，它较多地将笔墨集中在萨迦派的高僧大德身上，而对于世俗人物的注意则远远不够。它分别用 110 页和 79 页的篇幅叙述了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事迹，而对于八思巴的弟弟白兰王恰那朵尔杰则仅用了八行，就一笔带过了。藏文史籍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极不重视非僧人的政治活动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 6. 传记

藏文传记类文献有两种形式，一种称为 *rnam-thar*，叙述一位高僧从出生到圆寂的所有事迹，它分为内传、外传和秘传三个部分，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高僧和中世纪欧洲相当普遍的圣者传记，主要记述某位高僧学经、修法、游方、著作及其培育弟子、修筑寺院等内容。由于许多高僧大德都是他以前某位著名高僧的转世，因而他的传记往往都与其前世有关，也必须简略地记载其前世的生平事迹，因而 *rnam-thar* 有时也被称为 *skye-rabs*，意为转世世系。*rnam-thar* 类传记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位著

名的高僧都能找到他的传记，比较著名的有《米拉日巴传》《萨迦班智达传》《布顿仁钦珠传》《唐东杰伯传》以及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传记。这类传记除了是研究某个人物的最佳资料外，也是研究这些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情况的宝贵素材。同时，根据书中显示的高僧足迹，可以构拟西藏的历史地理，确定不同时期人口的流动情况。另外，还有许多传记中保留了一些编年史的片断和许多关于寺院建筑特点的记载，这也是弥足珍贵的。nam-thar 的写作方法千变万化，有的行文平淡，用口语写成；有的用诗体，辞藻满篇，充满诗韵。

另一种称为 Rtogs-brjod，即 mngon-par-brtogs-pa-brjod-pa 的简称，这个词规则地翻译自梵语 Avadana，或 Jataka。Avadana 原意为譬喻或出曜，是用十二种隐喻或故事的形式来说明教义的经典之一。后引申为对能够用佛经中的一个例子或故事来解释特殊事件。Jataka 则是关于佛陀本生故事的传记。这两种形式常常混合在一起，它既可以散文体作 Ava-danasataka，又可用颂偈体作 Ksemendra 或 Avada-naKapalata。Rtogs-brjod 类传记一般只记载某人一生中某个时期的特殊事件，而不是整个人生的事迹，比较著名的是朵喀夏仲才旺结的《颇罗鼐传》(mi-dbang-rtogs-brjod) 和《噶伦传》(Bkav-blon-rtogs-brjod)。前者通过颇罗鼐的生平记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西藏地区的重大事件；后者则用主要笔墨叙述了作者亲眼目睹的阿尔布巴叛乱和珠尔墨特叛乱事件。

## 7. 地理志

藏文地理书出现的时间很晚，到 19 世纪才有较完整的地理著作问世，数量也极少。最著名的是钦则的《卫藏圣迹志》(Dbus-gtsang-gnas-yig) 和敏珠儿诺门汗的《瞻部洲志》(vDzam-gling-rgyas-bshad，或译《世界广说》)。圣迹志即所谓圣迹指南，是具有很大实用性的地理书，编写这种书籍的目的在于为香客提供朝圣的道路、山口、寺庙等情况，其

主要价值在于它表明了每个圣迹的名称、地望，从一个圣迹到另一个圣迹所花的时间、路线，清楚地展示了这些地区的山川、道路面貌。另外它还对各寺院的建置沿革、著名大师和所藏身、语、意三门秘密做了记载。《瞻部洲志》顾名思义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作者在北京从一些俄国人那里获得了关于世界各大洲的地理知识，因此，他对于整个世界的地理情况都做了叙述，而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关于西藏地理的记载。它的写作方法与圣迹志基本相同，而内容扩大了很多，除了卫藏以外，还包括阿里三围和朵甘思六岗地区。

藏文文献中还有一种名为路引（Lam-yig）的地理书，它也是一种朝圣、旅行指南，内容与圣迹志（gnas-yig）相仿。例如六世班禅罗桑班丹意希所写的《香巴拉路引》，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桑结嘉措的《黄琉璃》在记述格鲁派历史时，也兼述地理状况，是一部格鲁派寺院志。《安多政教史》则是青海和四川东部的寺院志。噶陀司徒写成了 20 世纪的《巡礼记》，以日记体裁，详细记载寺院名称、特色和路程，可补充《卫藏圣迹志》的记载。

## 8. 寺庙志

藏文称为 Dkar-chag，意为目录，或称为寺庙传承史（gdan-rabs），主要记载各大寺院的兴建，主要建筑的修造经过、布局，寺院内收藏的主要佛宝，包括典籍、偶像和佛塔的目录等；另外也记载寺内住持的生平、寺院之施主名册和供养物清单等。寺庙志的大量出现是在明清两代。比较著名的寺庙志有公哥仁钦的《萨迦寺志》、多罗那它的《觉囊寺志》、五世达赖喇嘛的《大昭寺志》、阿旺江巴的《四寺志》、噶伦霞扎旺秋的《桑耶寺志》等。寺庙志的篇幅和重要性依它们所描写的寺院之声誉的大小而各有不同，有的只有薄薄几页，有的则洋洋万言。在寺庙志中往往能发现一些在一般著作中不易找到的地方传说，有时它们叙述的范围也

不只是一座寺院，而是涉及这座寺院所在的整个地区。寺庙志中大量关于寺院建筑和艺术造像的记载是研究西藏建筑史、艺术史所必须掌握的资料。由于寺庙志是为香客提供的一个导游手册，因而一般说来，它的文字尚平直，常用散文体写作，而其形式则比较精巧。

## 9. 年表

藏文称之为 Revu-mig，本义为山羊眼睛，颇似格子，取其形似而已，通译为方格年表，又因这种年表专门记述有关佛教的大事，所以又称为佛历表（Bstan-rtsis-revu-mig）。它是在编年史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大事年表。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能使读者方便地检索各类大事，并准确地确定其年代。最著名的年表有松巴堪布的《方格年表》和嘉木样谢贝多吉的《佛历表》，前者记载自藏历第一胜生第一年火兔年（北宋天圣五年丁卯，1027年），共720年史事，每年之下列有此年发生的政教大事，为研究西藏史之最佳工具。后者纪事的始年与前者相同，终年为第十二胜生木羊年（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它逐年罗列了688年间藏区宗教界所发生的大事，其内容多与宗教活动有关，间或插入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与前者相比价值稍逊一筹。

## 10. 名人录

藏文称之为 ming-grangs，几乎相当于近现代常用的“who is who”。它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各位高僧大德或著名政治人物的生平事迹，文字非常简洁，间或也抄引一些古代文献的原始资料。这类著作以隆多喇嘛阿旺罗桑著的《佛教名人录》和《佛教施主名人录》最为著名。前者成书于1779年，专门记载西藏佛教名人的身世和教法传承情况，尤详于噶当和格鲁两派。后者成书于1777年，他从《青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等史书中，提炼出西藏历史的主要线索，浓缩成一册，专

述西藏政治史上的风云人物，也辑录一些有关历史事件的原始资料，如乌思藏十三万户目下就转录了《五世达赖传》中有关各万户户口的记载。这两部名人录是可以相互补充、参证的姊妹篇。

## 11. 全集

藏文称之为 Gsung-vbum 或 Bkav-vbum。这是藏文文献中数量最大的部分，自元以后的高僧大德，几乎每一位都留下了洋洋可观的全集，有的也是同一教派的几位大师的合集。18 世纪末，隆多喇嘛编纂的《噶当、格鲁派高僧文集简目》收文集 40 家。19 世纪中叶，仲钦·喜饶嘉措编《罕见书目》，分藏文典籍为 12 类，其中文集类收 90 余家，1959 年，《甘肃拉卜楞寺书目》中分 17 类，文集类收 174 家。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由杰雅·贡布先生主编的《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共收文集 180 余家，足见此类著作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与汉地文人、学士和宦宦、士绅的文集一样，藏族高僧大德之文集的内容也很庞杂，且绝大部分是有关佛教经论的注疏和笺释以及有关大小五明的著述。但也有小部分是历史著作，或很有史料价值，而其他各类史书难以吸收的内容，如有关的档案文书、来往书信、皇上的诏令文告等。全集中出现的许多内容既可补其他史书之不足，提供新的史料，也可订正其舛误和疏漏之处。比较著名且史料价值较高的全集有《萨迦五祖全集》《隆多喇嘛全集》等，而《布顿仁钦珠全集》则被誉为藏传佛教的百科全书。

## (二) 藏文史籍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大量藏文文献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人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藏文史籍既能为其本民族历

史的研究提供最丰富的资料，使藏族历史的研究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也在于它能为整个中国历史以及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的历史和中亚地区的历史提供许多新的资料。藏文史料的出现才使它们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若没有藏文史料，则在它们的历史上都将遗憾地留下许多空白。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藏文史料对于研究西藏历史的意义。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是以汉藏文史料为基础的。在我国历史上，汉、藏两族之间长期友好往来，不断融合，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地理的阻隔和语言文字的障碍，因而汉族人对藏族地区的了解非常有限。现存有关西藏的汉文文献，特别是清以前的文献寥寥无几，而且就是仅有的一些资料也因受到作者观察角度、材料来源和思想观念的局限而出现许多的错误，因此这个基础是极不牢靠的。只有将对西藏历史研究的基础建立在丰富的藏文历史文献上，并以汉文史料的记载参证，才能使之立于科学的高度，否则难免雾里观花，隔靴搔痒，以致事倍而功半。

相对于宋、元两代而言，唐代留下的关于吐蕃的汉文史料算是比较丰富的，除了新、旧唐书中的《吐蕃传》以外，《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全唐文》等书中，都有不少珍贵的史料。苏晋仁先生曾对此有所辑录，有利于学者使用。因而，研究吐蕃王朝史，不能不重视这些汉文史料。但若光凭这些，则远远不够，因为在汉文史料中对吐蕃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人物和政治制度等缺乏记载，或者语焉不详；几种文献之中，也有一些互相抵牾的记载；还有许多用汉文音译记载下来的名物、制度，无法探明其渊源所在。显而易见，要将吐蕃史研究引向深入，还必须吸收新的养分。这个新的养分便是几经辗转而终于重见天日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它是当时、当地人记载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它的出现和一批藏文金石录、简牍的利用，使吐蕃史研究摆脱了困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不仅提供了大量汉文史籍缺载的新史料，如吐蕃的



军事、经济、政治制度、人口情况等，从而使吐蕃历史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且还纠正了汉文史籍中的不少谬误，印证和补充了汉文史籍的某些记载。许多在汉文史籍中找不到头绪的问题，在藏文史料中涣然冰释。

自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开始，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为止的400年间，西藏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中原汉地也先后处于五代十国和宋、辽、夏、金几个政权鼎立的局面下。虽然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从未中断，特别是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往来较前有所发展，但双方的联系与唐代相比毕竟要少了许多。因而汉文文献中关于这个时期西藏历史的记载极度贫乏；就是犹如天女散花般植于茫茫文海中的零星记载，也多半是关于安多和康区藏族的情况，而关于卫藏地区的记载实难觅得。毋庸置疑，这400年西藏历史的重建只能依靠藏文历史文献。尽管从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藏文文献并不多，而且都是一些伪托的“掘藏”，但后出的教法史、史册大多辟有专门的章节，记载这个时期的历史，例如《布顿佛教史》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介绍后弘期佛教的发展史。几乎每一个教派的教法史、世系史在叙述其肇始、兴盛的历史时，都要着力描述它们在这个时期的形成和发展情况。因为除后期的格鲁派以外，藏传佛教各宗派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具备其各自的特色的。另外，叙述这个时期高僧生平的传记，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素材，如《米拉日巴传》《玛尔巴译师传》等传记中关于当时乌思藏地区社会、宗教生活的描述，实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好资料。总而言之，只有从大量的藏文史籍中去追根溯源，将每个教派的渊源和形成过程搞个水落石出，然后才能重新构拟当时整个西藏的总体面貌，这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

元朝统一并有效地管理了西藏地区，从此西藏历史与中原历史的关系愈加紧密了。西藏作为元朝统治下的一个行政特区，它的历史自然就